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 影像精选集

孙明经 摄
孙健三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
影像精选集

孙明经 摄
孙健三 著

责任编辑：王嘉文 张 磊

装帧设计：张 磊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印制：汪立峰

项目策划：王玉龙

本书为  北京电影学院科研信息化处出版资助项目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影像精选集 / 孙明经，孙健三著.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7.3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ISBN 978-7-5514-1649-8

I. ①孙… II. ①孙… ②孙… III. ①新闻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J4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0814号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

影像精选集

孙明经 摄

孙健三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9646 85159574 85170614

网址：www.photo.zjeb.com

制版：杭州真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9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1649-8

定价：88.00元

序

半个世纪的再回望

杨恩璞

孙明经教授，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奠基人之一。1957年夏，我进校就读时正是“反右运动”的高潮，电影学院领导把孙先生列为“右派”，但摄影系有些学生佩服他的学识而给他辩护，引起激烈的争论。我第一次见到孙先生时，他正在大批判会上挨斗。当时我才十七八岁，是个涉世不深的新生，人云亦云地也认为他是个思想“落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是荒唐。20世纪80年代，孙先生获得平反后，我等后辈纠正极左偏见，重新回顾他的教学生涯和摄影创作，发现他是我国民国时期杰出的摄影人才。2016年，我有幸拜读其子孙健三编撰的本书，再次促使我对孙教授有所反思和探求。该书中不少资料和图片，我在20世纪60年代留校任教时期还曾看过。当时，由于摄影系的办公室很挤，我们就把从金陵大学迁移到北京的教学设备和资料堆积在实验室的角落。实验室还有一台16毫米电影放映机，供我们学习放映电影，于是我们就从金陵大学影音部搬迁来的设备中找到数量不少的16毫米完成片，用它们来练习放映……后来又从中发现不少20世纪三四十年代拍摄的老照片，得知都是孙明经先生拍摄的。那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并没有把这些影像作品当一回事，误以为是些无足轻重的素材或随意记录的资料。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记录摄影）。记得在1958年，玛格南图片社抓拍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来华拍摄的作品还被中国摄影家协会组织批判了一通。什么是好摄影？那时我们崇拜的不是新华

社、《人民画报》所谓的“艺术性”新闻图片，就是香港沙龙的光影造型。今天，我重新审视孙明经先生民国时期的作品和教材，才觉豁然开朗——它们不就是我国早期的纪实摄影和基础理论吗？尽管它们略显稚嫩，却是难能可贵的先行探索。

孙明经和夫人吕锦瑷是民国时期南京金陵大学摄影专业的开创者，孙明经除了担负摄影全部专业课的创建和教学重任，还热心从事纪实摄影活动（包括电影和图片摄影），这主要是受当时的教育家蔡元培、电影事业家（中共地下党员）郭有守的影响，拥护、信奉他们主张的“影像服务社会大众”的价值观。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他在通电全国时就把教育和图像、影画联系在一起，说“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通令各州县宣讲，或备有益之活动影画，以为辅助。”1932年，蔡元培发起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并担任该会主席，并指定郭有守为驻会（常务）第一执行委员，具体主抓教育电影制作和评奖。从孙明经简历年谱以及他撰写的《电影与动员民众》《电影自述》文稿中，可以看出他对蔡元培和郭有守的响应与合作。孙先生的摄影道路和当时中国摄影沙龙团体不同，极少远离现实生活，并不热衷于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孙先生认为，摄影载体“是道地的国际朋友、大众语言，无处不通”，电影和图像“是历史，为着后代保存哲人和英雄；不怕宗教信条迥异，人人都能看懂，用艺术和科学充实人们的生活”。所以，他总是结合社会需要和普及科技研究的目的，进行有主题的创作。

在教学之余，孙先生从1934年至1949年，时断时续地拍摄纪实类电影和图片达15年之久。尽管受战火和“文化大革命”涂炭，损失惨重，但从现存残卷看，他的作品仍弥足珍贵，给中国历史画谱增添了丰富的影像遗产。特别是以下几次国情考察拍摄采访活动，是民国时期纪实摄影可圈可点的篇章。

（一）1937年6月至7月的万里猎影

孙先生从南京出发一路北上，途经徐州、淮北盐田、连云港、山东枣庄以及北平、绥远等地，原先计划在北平与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汇合，参加暑期西北科学考察团。但刚出发活动，就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考察拍摄不得不中断。尽管这是一次夭折的国情考察，但在旅途中，孙明经先生眼捷、腿勤、

手快，还是拍摄到了许多有历史价值的片段。如八达岭铁路和南口机务段，不仅展示了以詹天佑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智慧创造，而且还透射出华北地区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某种紧张气氛，这套组图现在成为中国铁路发展史的形象佐证。

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一天（1937年7月6日），孙先生在绥远拍摄该省中小学教师集训的操练。画面上，全体老师顶着烈日、光着膀子做着傅作义将军倡导的“‘抗日’皮肤操”，在侧逆光的照耀下，他们健壮的体魄分外夺目，显示出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与日寇决战的豪迈气概。

（二）1938年至1939年大西南的抗战纪实

1938年，孙明经随金陵大学西迁到达重庆，继续开办影音专业教学。当时，日寇疯狂轰炸重庆，他勇敢地拍摄了日寇大轰炸的照片和电影，记录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同时，受政府要员钱昌照、郭有守和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理学院院长魏学仁的派遣，孙明经赴自流井、贡井两地区拍摄电影和照片，完成电影《自贡井盐》《井盐工业》以及有关（纪实摄影）图片组照。

1938年初，日军占领我国东部海盐产区以后，正在苦战的湖南、湖北等地军民断了海盐供给，一时人心惶惶。于是，国民政府出台“川盐济楚”国策，就是用四川生产的盐接济湖南、湖北等地。1938年4月28日至5月5日，孙明经对井盐产地四川省的自流井和贡井地区进行了为期8天的考察拍摄，完成电影《自贡井盐》和组照拍摄。这批作品反映了自贡产盐的大好形势与民间制盐的智慧创造，以及盐工勤劳刻苦支援抗战的坚毅品格，在当时对鼓舞抗日士气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我认为，此间孙先生的纪实摄影达到了他影像创作的高峰。上述作品，在选题内容上积极配合抗日救亡的时代需要，体现出他从事纪实摄影的国民责任感；在手法上，已自觉把握了纪实摄影的美学准则，质朴真实地记录客观世界的原生态。

（三）1939年、1944年两度赴西康科学考察

1939年6月至12月，孙明经参加“川康科学考察团”，从重庆出发，经成都 -

雅安 - 天全 - 荣经 - 汉源 - 冷碛 - 泸定 - 康定 - 贡嘎山 - 八美 - 丹巴 - 道孚 - 炉霍 - 朱倭 - 甘孜 - 雀儿山 - 德格 - 白玉 - 沙马 - 巴安（今巴塘） - 义敦（今措拉） - 理化（今理塘） - 雅江 - 康定 - 雅安返回成都，其行程极为艰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穿越急流险滩，深入内地矿山和康藏部落。

此次考察，孙先生收获颇丰，拍摄了《西康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和《喇嘛生活》等八部影片。孙明经在理论归类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电影明确定位为“纪实影片”。在孙明经的电影中，熊猫首次登上了中国银幕；此次考察还拍摄照片2200幅，选编为十集画册。

1944年8月，孙明经及夫人吕锦瑷携领金陵大学教师和学生再次深入当时西康省的雅安、康定等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运用影像进一步表现西康省（当年的西康省金沙江以东今属四川，金沙江以西大部今属西藏）甘孜、康定和雅安等地区的宗教、民俗，以及茶马贾道的前世今况。

1939年和1944年的两度川康考察拍摄，其成果不是一般风光旅游片，而是具有重大科研价值的影像文化，孙明经完成的影片和图像从社会学、民族学和历史学、地理学的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揭示了川康地区的国情民俗和自然资源。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它对于我们进行经济开发、历史研究、传承民间艺术以及处理民族宗教事务等，都具有宝贵的意义。

例如，对于川康地区的交通贸易，究竟叫茶马贾道，还是茶马“古”道，在学界就有不同的说法。其实，“茶马古道”是以讹传讹。当今许多地方为发展经济或旅游，故意混淆“贾道”与“古道”，争抢署名“茶马古道”，用马匹驮茶注册图案，甚至在某些博物馆还展示着马匹驮运茶砖的“历史画”。

而实际情况却是：茶马贾道从起点雅安至康定为第一段落，内地茶商雇佣人力背运“雅安边茶”至康定的各个锅庄（在康定，锅庄就是驿站）内，等候藏商或康商用马匹来商贾（货物交易），所以得名为“茶马贾道”。

完成交易后，藏民用牦牛驮茶远送草原和边陲——驮运分南路、中路、北路、东路再南运、西运、北运为第二段落，过金沙江或进入青海后为第三段落，而汉人茶商则赶着买来的马群回内地。

重温孙明经先生拍摄的影像画面，能帮助我们穿越时空，看到真实的历史环境

和当时的商贸活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堪重负的内地民工背夫背扛着二三百斤的茶砖大包长途跋涉在崎岖山路上；也可以看到康巴驿站——锅庄的原貌，以及茶马贸易的具体细节……更难能可贵的是，孙先生还爬到跑马溜溜的山上拍摄了康定城的鸟瞰全景，展示出当时当地的市容和宗教寺院，形象地证实了1939年茶马商贾的发达给西康带来的经济繁荣和多元信仰。

还需补充指出的是，孙先生除了热心拍摄，还遵照蔡元培恩师的教导，登门拜访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宗白华、北平国立艺专教授徐悲鸿等人，求教纪实摄影美学教材编写。他初知先觉地对纪实摄影的真实性和欺骗性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对如何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如《诗经》《孙子兵法》和《资治通鉴》等）发展纪实摄影美学等启动了学术思考。

纪实摄影定格历史、还原真相，它推动时代文明和社会进步功不可没。但在历史上，纪实摄影的发展又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它直面现实、针砭时弊，难免会遭到政治偏见和文坛学阀打压。孙先生的纪实电影和图像也是一样，曾经几度风霜，被流失、被误解。但真理是不可能永远被封杀的，所以纪实摄影又似同陈年杜康，尘封愈久愈有芳香，愈被人赞赏。50年后再次拜读孙明经先生的纪实摄影，我更觉得他的作品开创了中国纪实摄影的先河，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价值。同时再次验证一句名言：“是黄金迟早会闪光的”，他的作品一定会传世流芳，一定会得到人民和社会的肯定。



2016年8月27日

写于美国马里兰州绿色山庄

[注] 序言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曾兼任电影学院学报执行副主编；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该会金像奖评委；中国民族文化促进会摄影专业分会副会长，并任该会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评委。

目 录

孙明经纪实摄影的初步研究 / 1

孙明经纪实影像精选 / 55

孙明经纪实摄影的初步研究

孙健三

今天，不论你在世界的何处，输入并点击搜索“中国电影高等教育开山宗师”，就会看到很多关于孙明经老师的有趣内容。

2016年，是孙明经老师成为我国摄影、电影、电视和播音高等教育第一位专职教师以后正式开班授徒的80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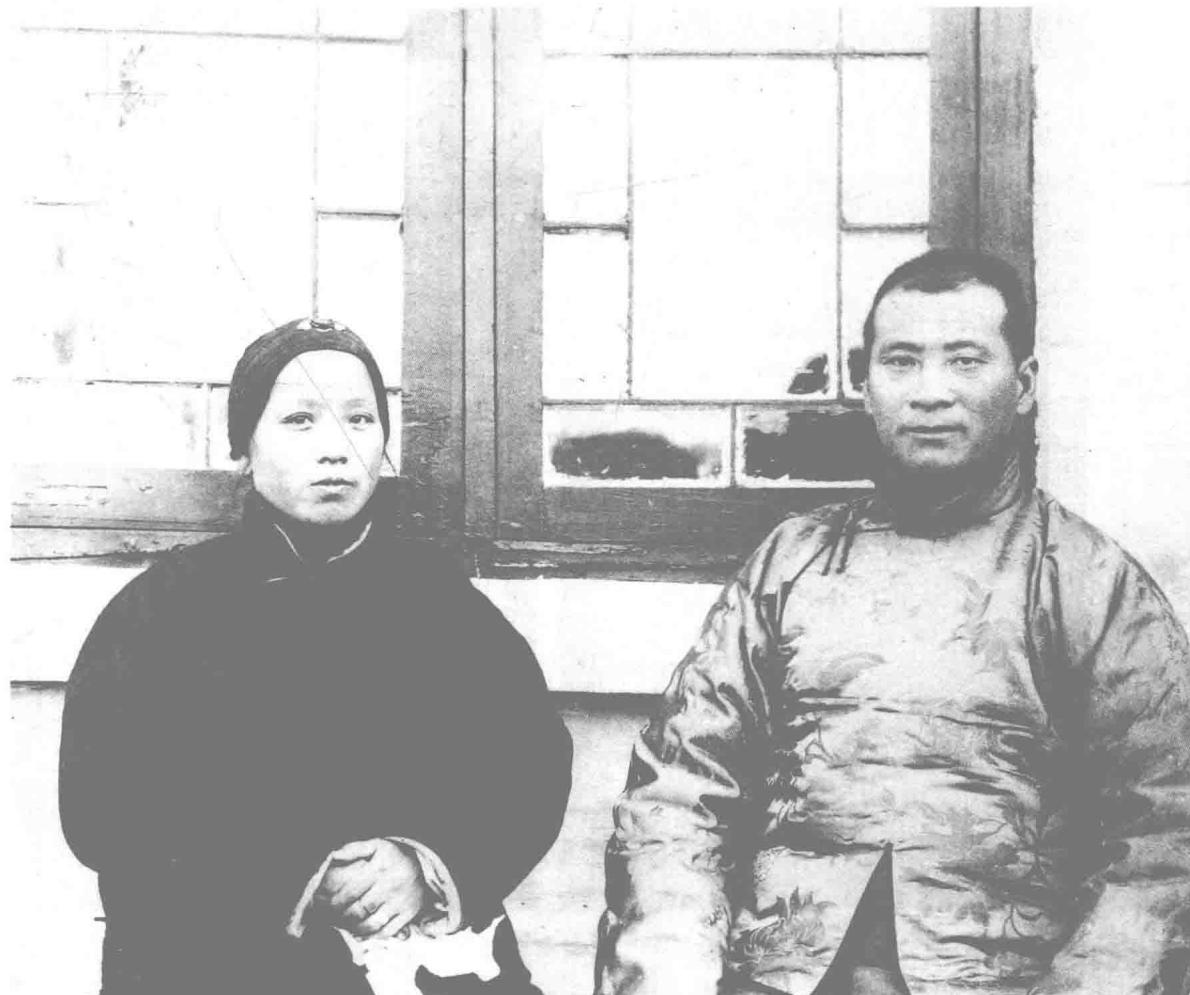


图1：1901年1月1日，孙明经的母亲孙隋心慈用没有自拍功能、甚至连快门都没有的相机自拍了她和丈夫孙熹圣的照片，从此，自拍成为这个家庭的一种传统。2005年，这幅照片被评选为“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编号002），载入中国摄影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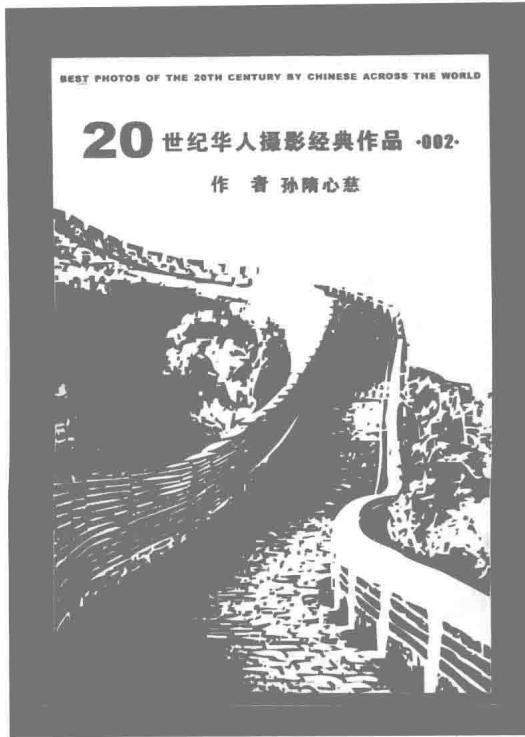


图2、图3：孙明经母亲于1901年1月1日的自拍照入选“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上图为获奖证书正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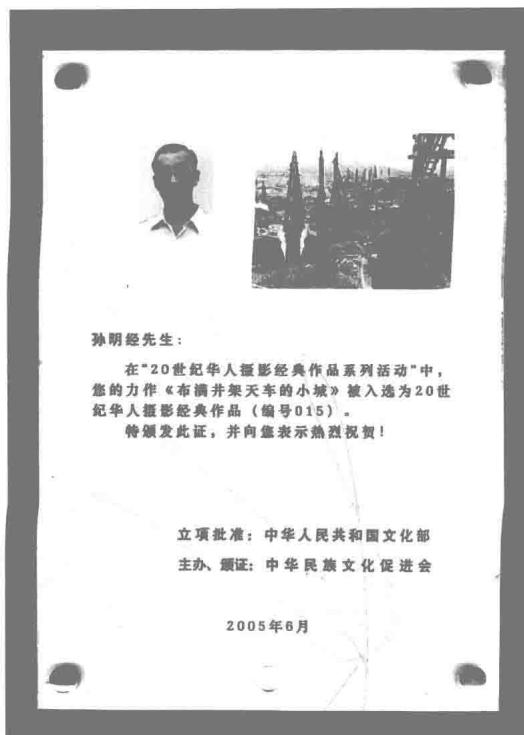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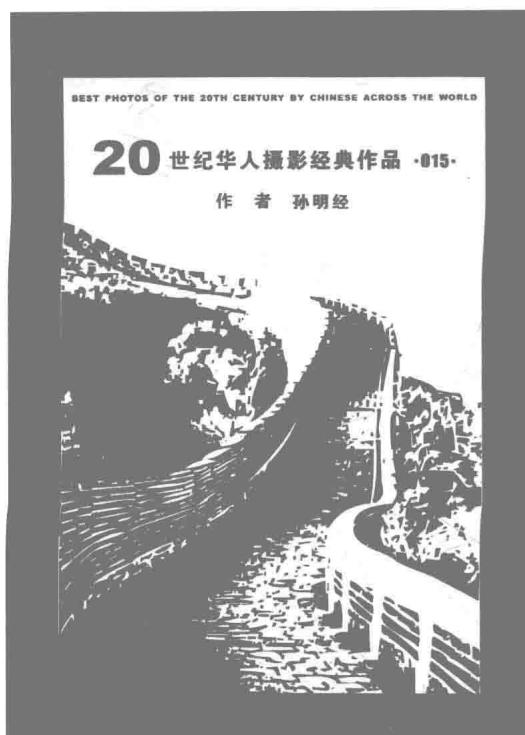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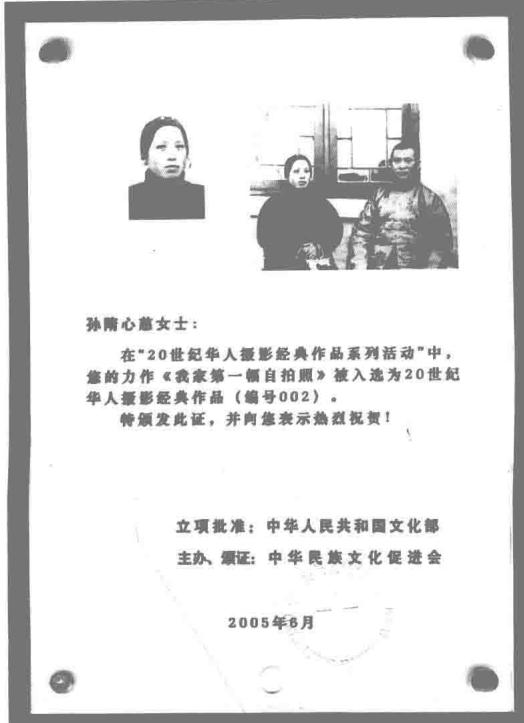


图4、图5：孙明经于1938年4月拍摄的纪实摄影作品《布满井架天车的小城》和母亲的作品双双同时入选“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成为唯一一对作品同时入选的母子。



图6：1913年10月31日，孙明经2周岁，身着母亲亲自缝制的新衣留下了这幅照片。今天会有人以为照片上是一个穿着韩国服饰的小男孩，其实，这正是当年我国胶东地区的标准传统汉族中式男装。



图7：1912年，母亲孙隋心慈为1岁的孙明经拍摄的照片。

1911年，孙明经诞生在一个“影像家庭”之中，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在19世纪的大清帝国，居然会奇迹般的不是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个生活在19世纪80年代清帝国晚期、就读于山东半岛东端我国第一所和世界接轨的大学登州文会馆的大学生，他们自由恋爱的起始，居然会缘于课堂上看到的一幅洋人学者在北京远郊的大山之巅拍摄的长城照片。

照片与影像，从此成为这个家庭的图腾。



图8：1916年，孙明经5岁，母亲为他和他喂养的两只可爱的小羊拍了合影。



图9：1918年，孙明经7岁。他手持初小毕业文凭，在父亲工作的单位南京汉中堂门前用母亲创造的方法自拍与父亲的合影。



图10：1926年，孙明经15岁，用母亲创造的方法自拍15岁小照。



图11：1934年，在苏州虎丘，高中时期立志要亲手制出国产感光胶片的吕锦瑷完成了她和孙明经的第一幅自拍照。



扫一扫看更多

我们的先辈们曾经善于用耳却弱于用眼

我们中华民族，无论科学或是技术，无论经济或是财富，几千年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曾经都是人类的排头兵。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中华大地的地下挖出点什么“老物件”，那其中的科技含量常常令世界为之惊叹。陆上的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曾经为西洋点燃了文明的曙光。鉴真和尚东渡，曾经为东洋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我们中华先人们的耕耘与“播撒”，把东洋和西洋统统闹得文明了、现代了，后来——我们自己居然变成了“落后就要挨打”，居然变成了列强们欢庆胜利的宴会桌上的糕饼……

为什么科学技术曾是人类排头兵的中华民族，居然会变得“落后就要挨打”？

西洋学者们踏上各式各样为寻找症结的探求之路。

美国学者丁韪良和狄考文是这些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人物。

在种种寻找与探求中，1863年，一位名叫狄考文的年轻美国学者，和他新婚蜜月中的妻子美丽的狄·朱丽叶（又译为狄邦就烈），隐隐约约地感到他们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他们发现，中国人使用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亿、兆……难以在“当代”的中国以外的世界通行的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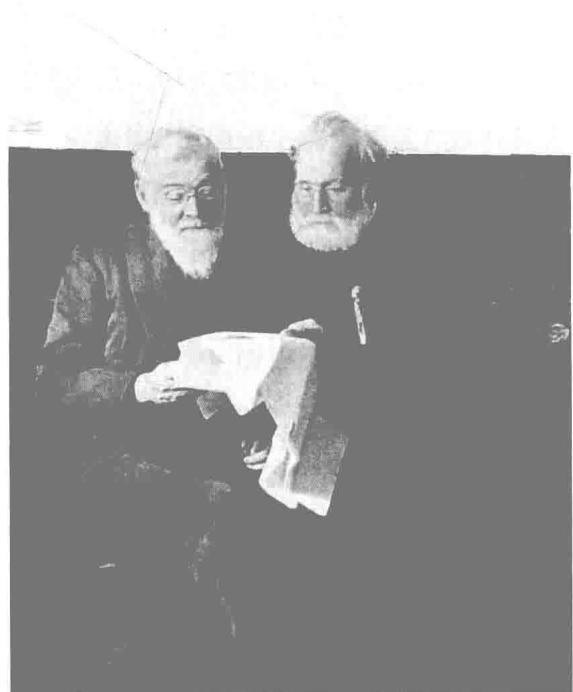


图12：狄考文（左）与丁韪良（右）。原照今存于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学、物理、化学、机械、冶金、铁路、建筑等各种科学领域中得心应手地运用！这导致整个中国知识界难以借助世界科技界所有已经取得的成就，因为当时中国以外的世界科技成就无一可以离开“运算”，而在疆域浩瀚的中国使用的“数学语言”，无法和正处在蓬蓬勃勃汹涌向前的工业革命的世界对话，无法和世界的工业革命大潮与成果接轨……

他们发现，很多中国人拒绝“照相”，理由仅仅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顽固地认为照相会“夺去人的灵魂”。1839年照相术在地球上的诞生，为人类认识、处理、传播知识与信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由此造成的人类“获取知识”“传播知识”的方法与理念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知识界拒绝照相，造成整个中国无法借助照相术带来的“学习革命”“信息革命”和“传播革命”的一切好处与成果。

太平洋对岸蜜月中的两个年轻人，面对自己的重大“发现”，产生了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在蜜月中做出一个决定：到地球的那一面去，把 1234567890 、 $\pm \times \div = \{ \} < > \% \dots \infty \dots \dots$ 还有小数、分数、微分、积分等运算方法与学理以及照相术为人类认识世界、认识宇宙、获取知识、传播知识的方法和好处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传播。

19世纪的美国知识界中，有一种认知：美国的立国，源于新大陆的发现，没有新大陆的发现绝不会有后来美国的立国。而新大陆的发现和欧洲人对美洲的占领开发，则得益于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

19世纪的美国小学和中学教学中，有“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以及“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的教学内容。

美国的立国，也源于当年很多很多欧洲人的“大航海梦”。

因此，一代一代很多美国年轻人的血液里都奔腾着“大航海梦”的遗韵与基因。

没有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和火药，我们的世界就不会有“大航海时代”的实现。

美国的立国与那篇著名的《人权宣言》，把“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植入了一代代美国年轻人的潜意识当中。“曾经为全人类也为美国发明了指南针和火



图13：1937年1月，孙明经在大同云冈石佛寺所拍摄的金面佛即“眯眯眼”造型。



图14：1938年6月，孙明经在当时四川省嘉定县（今乐山市）拍摄的乐山大佛即“眯眯眼”造型。

药的中国，应当享有运用1234567890、 $+-\times\div=$ {}<>%
 $\therefore\therefore\infty\dots\dots$ 还有小数、分数、微分、积分等运算方法与学理以及照相术成果的资格与权利。”于是，这一对年轻人来到了中国，他们选择了齐鲁大地。

这一对蜜月中的年轻人的这个决定，竟然为古老的中国近代历史里那一段“西学东渐”运动创造了一段传奇——这一对踏上齐鲁大地的洋人的步伐，竟然就此成为我们这块古老大地上“和国际接轨的近代高等教育历史的开始”，他们二人不仅成为中华大地上第一所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创办者，也是最早用1234567890、 $+-\times\div=$ {}<>% $\therefore\therefore\infty\dots\dots$ 还有小数、分数、微分、积分等运算方法与学理在中华大地的高校中开设课程，从而开启让中国人真正开始接受和运用乃至与世界共享一切人类在“数学”、包括“摄影术”领域在内成果的时代。

对照相术成果在中国的传播，狄考文夫妇意外地发现了中国知识界中很多人拒绝照相有更为有趣的深层原因。

初到中国，在狄考文夫妇开始按照美国的学校样式和教育理论创办学校之初，夫妇二人以惊人的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当他们第一次在中国过大年，被带到登州城里的大戏台前观看中国人演出的中国戏剧时，狄考文夫妇发现了一个让他们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事实——教他们中文的人告诉他们，当地人把观看戏剧演出称为“听戏”而非“看戏”。明明白白数以千计的人挤在大戏台下一起观看台上的戏剧表演，为什么当地的中国人会把“看”戏，说成或理解成“听”戏？狄考文和夫人在和中国当地民众第一次一起“观看”中国戏剧之前，为了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他们要求他们的中文教师带他们到中国的庙宇和中国的“图书馆”。在登州和登州周边的庙宇和

“藏书楼”中，狄考文的夫人狄·朱丽叶注意到一个细节或者说现象——在中国的庙宇和“藏书楼”中，他们看到凡地位高的佛像或地位高的人物像，无论是塑像、雕刻像或是画像，都是“眯眯眼”。尤其是相当于西方“美女画”的中国“仕女图”中的“淑女”们，全部都是“眯眯眼”！

狄·朱丽叶和自己的丈夫讨论了这个现象，“这种由中国人塑造、雕刻或绘画的中国人物的眯眯眼细节，到底源于中国人的审美，还是生理？”他们开始在现实生活中观察身边的中国人，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或可称为细节——他们能接触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用眼睛专注地“看”的时候都会“眯”起眼睛，而这正是“弱视”或“近视”者的典型生理表现。

夫妇二人发现他们接触到的“中国人”的视力竟然普遍表现为弱视或近视……

狄考文夫妇在“考察”登州和登州周边当时的中国学校——私塾和学馆时，他们看到的竟然是私塾和学馆的先生们闭着双眼摇头晃脑地一句一句高声歌咏，一群“学子”们同样闭着双眼摇头晃脑地跟着私塾或学馆的先生一句一句地歌咏。

两位洋学者产生了好奇：为什么中国教师和学生在“学校教室”里的“教”与“学”会如此用“耳”与用“眼”？

狄·朱丽叶注意到，她和丈夫考察过的当地所有的私塾或学馆的“教室”和美国学校的教室有一个显著区别——登州“学校”教室的窗户都很小，窗户上没有玻璃，只有一层很厚的、透光程度远远差于玻璃、被当地中国人称为“糊窗户纸”的纸张。私塾或学馆“教室”中光线昏暗，即便是户外阳光最明亮的中午，狄·朱丽叶发现自己在这样的“教室”中也难于看清和辨认手里英文书籍上的印刷字母……在这样的教室里“看书”，狄·朱丽叶发现，她身边的中国人不仅不会睁大眼睛，反而一定会眯起眼睛！

这一发现使狄·朱丽叶惊喜，觉得一下明白了一个她刚到中国时便十分好奇的事——为什么印刷版本的中国书籍中的每一个字，都比英文书籍中的印刷体字符大得多？（见图15）

这一发现，使狄·朱丽叶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找到了答案。

但是，当狄考文夫妇第一次在登州过大年，第一次和数以千计的中国民众一起观看中国人演出的中国戏剧时，“这种中国人塑造、雕刻或绘画的人物眯眯眼现